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百家争鸣】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小 鹰
【书刊评论】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胡 平
【劫后反思】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一）	陈 坡
【千秋功罪】	两派红卫兵，为什么都不愿意道歉？	谌旭彬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百家争鸣】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 小 鹰 •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 50 年了，还在争论不休。

最近，读到华新民先生 2006 年写的《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这给了我一个基础来思考：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这篇评述虽然是十年前写的，但文革研究的状况和思路，至今恐怕变化不大，所以我就先由此谈起。

从华文的介绍来看，“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说法，“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防修’”，这也是“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见。

而他所介绍的多数非官方学者均放弃了这一途径，转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上去研究。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

毛泽东“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华文最后综述道：“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

然而，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

看来，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这种转向似乎是想绕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那就是官方宣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么，如果再按“毛泽东自己的说辞”去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就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一提到刘少奇是“走资派”，他在“义正词严”的毛泽东面前，似乎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毛要打倒“走资派”，谁又能说个“不”字呢？因而一些学者干脆否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刘少奇是‘走资派’”，认为“毛刘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从而就方便地搁置了毛自己关于“反修防修”的说法。

可是，这样消极地回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派’”的这一明显的宗旨，便放弃了一个论辩的主战场，即毛刘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

今天看来，我同意华文中所肯定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但是，我不以为由此就只能从政治家的“阴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去寻找其“隐秘动机”，也不期待通过“考据和索隐”去发见最新“密笈”，去解读“只言片语”，甚至从“传闻”、“八卦”与“宫闱私房话”里，企望“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原因”、“大秘密”！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和体制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来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路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否则，难道人们日后只要精心甄选“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后来，有些学者重新开始接受毛泽东的说法，但又无法否认文革失败的事实，就索性归结为“试错”说。也就是说，毛是“好心”尝试，但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那么，他就是一个“敢于‘吃蜘蛛’的勇士”罗？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思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先生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

应当肯定，杨文正确地批驳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说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恐“大权

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

杨文也正确地看到了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但是，在这个分歧面前，杨仍然没有能够超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这个“障碍”。杨仍然肯定“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不过毛是“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结果，结论还是毛的“主观意愿”是好的，“文革的宗旨”是对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

正是拘泥于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善’”的假设，杨不但不能认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合理性，反而迎合毛泽东的煽情说法，给刘戴上了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由此杨把文革曲解为由毛“怀着深深的忧虑”而发动的一场“反官僚”运动（即由所谓“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所引起）；同时杨又认为，因“极权体制”所限，文革也是由毛一手操纵的一场官场“权力平衡”的游戏（即由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所引起）。结果，在今日一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反倒成了一位因反官僚、反贪腐而“失败的英雄”。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恨左不恨毛，官员厌毛不厌左”，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厌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

“勇士”也好，“英雄”也好，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与上述的“心理”说、“阴谋”说、“争权”说、“试错”说，以及“官僚”说等思路相反，在我看来，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例如，毛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在这一点上，我接受毛泽东自己关于“文革宗旨”的这一说法，而且，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官僚”，他就是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但是，我要问的是：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动机，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他那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豪言壮语”，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党内真的就没有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吗？如果有，那到底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和需要，还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会怎样看待“毛刘之争”？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也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如果把这场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官司”打到共产党祖宗马克思那里去，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反走资派”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详见：小鹰：《论“文革”的反动性质》，2016年1月）

因此，这里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政治家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了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我主张在文革研究中，把刘少奇和毛泽东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切割开来，目的是为了彻底孤立和剖析毛泽东。

先生们，我这样做，是想在研究思路上有突破。我根据史实和文献，以上述方式把刘少奇和马克思作为正因子项引入“文革方程式”，再加上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地域的“边界条件”，看能解出来什么？希望这解不但能在统计上符合以往的数据，同时也能以后的运动轨迹提供些指示。此外，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包括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言论自由”等等。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详见：小鹰：《“文革”对话录果(续)》，2014年6月）

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已经“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许多人不了解，“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总而言之，“破除障碍、抓住矛盾、搞清概念、辨明是非”，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一个想法。

写于2016年4月

附：质疑和讨论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4月11日XXX来邮质疑：

你一直在马克思的旗下批毛，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把取缔私有制作为目标，根本上违反了人性，违反了基因的力量，这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不是理论问题，实践已经给出结论。人性可以走向文明，但无法“无私”。（除了少数极虔诚的教徒）

4月11日小鹰答辩：

你说得不错，但看来你混淆了苹果和桔子，思维有点跳跃。

我不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认同马克思。况且，1949年的中国也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革命。我这里问的是：像那时中国这样落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该怎样做？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还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他这里并没有讲要废除私有制的问题，而是要破除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

换句话说，认为手推磨就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那是毛泽东发明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国家，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否定表达式。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毛泽东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要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从这里切割开来。

与毛泽东相反，建国初期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很有眼光，也很有勇气。无论你怎么不喜欢刘，仅从这一点来看，他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这是刘与毛的重要区别所在，也是毛最终要打倒他的原因。

现在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先生在内，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粗粗一望，便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合理的部分也加以否定。这样做，恰恰是掩盖了毛泽东致命反动的地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因而也不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

至于你问道：“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

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应当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我在《论“文革”的反动性质》中那六道思考题里也有如下一问：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必要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请注意，他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政治制度”所用的三个定语都是明确限定在“现代的资产阶级”之

下！)1949 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马克思 1848 年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讽刺说，他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倒德国时，却没有能同时把“法国的生活条件”也搬过去。他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上述那些落后地区搞“社会主义”时，又有哪个国家先有了“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说“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这听起来，好像马克思也是在教训毛泽东。注意，他这里所用的定语又都是“资产阶级的”。要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能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被“激进党人”诅咒的东西，那就好了。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自由主义”，没有“代议制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不是？然而，自毛泽东掌权以来到文革失败为止，他一直竭力要破除和防止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却正是马克思期望当时的德国，以及所有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首先去争取具备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所以，我要问你，你看出这里的区别吗？你真的认识你所谈论的那个马克思吗？

1945 年党内外有个“新民主主义”共识：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如果真让刘少奇按“新民主主义”所说那样做，那起码是个起步。从 1951 年起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那到了 1961 或 1971 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若是刘不行，以后也不是没有像胡耀邦等那样开明的领袖。这就是“道路”之不同。

所以我说，建国以来是有毛、刘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刘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毛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以上是我的一些基本点，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质疑？不错，我们“人微言轻”，但只要能“言之有理”就好。我们能有针对性地谈问题，很好。欢迎进一步批评讨论。

## 二、有关“心理”说和“路线”说的讨论

4 月 13 日 YYY 来邮讨论

我很同意你对毛泽东路线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经过大饥荒和后来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刘少奇等人已经纠正了毛的路线，相信毛也知道自己路线走不通，他在 1965 年跟彭德怀谈话说历史也许证明你是对的（大意）。换句话说，“试错”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还要不认账，反而变本加厉发动文革，就不能不让人们追问他的个人品质和权力欲了，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并没有刻意庸俗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毛泽东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治国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是值得继续深入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面对自己路线的失败后采取的态度同样值得深入挖掘其根源的。正如有不少人指出，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也是一种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我觉得两方面的分析不必分孰高孰低。

4月14日小鹰回邮

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如你所说，是正常而无可非难的研究途径。我也认为：“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

但是，我为什么又要问：“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呢？请允我解释。

如我上次邮件里谈到最近《炎黄春秋》上王蒙的那篇反思，它除了对毛的性格描述和现象叙述之外，并没有谈出个文革发生的“所以然”，属于很一般化的“控诉”。它基本上还是官方的“反修防修”、“毛与百姓同在”的说法，不过加上了一些对毛的“荒唐事”，及其心理、品质、作风上的调侃。而这类对毛个人的讽刺、揭底的文革反思，目前国内或许还能够为当局所容忍，因为毕竟这只是毛后期个人的事，共产党还是“伟光正”的嘛！而毛乱搞女人，现在已为众所周知，如果再加上政治上阴险狠毒的行为，即使以“心理阴暗”和“人品低劣”来描述，可能会把毛进一步搞臭，但很难说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力量。“毛粉”仍可以用“风流亦伟人，无毒不丈夫”一句话来自慰，即“大人物要看大节”，“阶级斗争嘛，就是要不择手段”！所以还是打不倒他。

但是，如果我们把“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去，揭穿毛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沿这条路走下去，这就可能要颠覆整个毛派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了。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原来毛只有“秦始皇”，没有“马克思”！这恐怕会令当局更加恼火和恐惧，也会让“毛粉”冷静下来想一想。所以，把马克思同毛泽东切割开来，也许更有意义些。当然，“心理”说与“路线”说，二者并不对立，也不分孰高孰低，它们是互补的关系。

此外，如果只是因回避“官方障碍”转而由“心理分析”来揭批毛，那比刻意否定有“路线斗争”，要好很多；更比接受“官方的说辞”，但又搞“试错”说或“官僚”说，把毛开脱为“勇士”、“英雄”，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批评的重点是后者，不是前者。

第二，你谈到：“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对此，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建国以来，毛和刘派，在许多重大的具体问题上，如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等，经常是“面和心不和”地明争暗斗。文革前，毛遭遇的所有失败恐怕并没有使他认为“自己的路线走不通”，相反，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分歧”根本就是个“道路问题”。因此，他是“为了彻底解决中国‘走资派’的问题”，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来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战略性的行动，不是一个如“庐山会议”那样的战役，尽管刘少奇那次是站到了毛的一边，但在战略上，毛是把刘看作自己的死敌。所以我说“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而不只是个“修复面子的工程”。

至于说到“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那人们会问，在拿掉了刘派之后，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这就不可以简单地用报复“政敌”、挽回“面子”的心理来解释了。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要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而另一方面，刘少奇等也不是些等闲之辈，刘有着自己的“走资派”理念和建国蓝图，麾下也有一帮强悍的人马，包括党内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双方的较量最终是要走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我们把他们之间的斗争低看为“妇姑勃溪”，或是些市井小人、婆媳争斗，那只是把我们自己降低到这一水准去了。

从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反问，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整治那些使他“恨、羞、怒”的同僚，只是他的阴暗心理因素在作怪，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又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长期以来毛收拾这些人，不是“得心应手”、“踌躇满志”，一贯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吗？

而实际上，文革中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这些人又怎么使他“心理不平衡”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显然，毛不但要清除他的“走资派”政敌，还要彻底扫荡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实现他的“大同世界”。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毛的这种理念，完全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一种极其凶恶和反动的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你看，这样来解释，是否更合理些？

最后，我不是说，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心理因素的支配，相反，对毛的远近“心理分析”尤其有必要。但是，如果“心理”说把眼光只集中在“宫廷”内个人的角斗上，却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上“两条道路”大尺度的博弈背景，就容易钻进“牛角尖”去。所以，我说，纯“心理分析”这条道，可走，但走不了多远。

关于“庸俗化”的问题，不是指华文评论中的那些严肃的学者，他们的分析还都是有根据和有说服力的。但近来确有一类“大嘴”热衷于以此来吸引眼球，甚至编造些文革内幕故事，以求“耸人听闻”。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最新发现”——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1966年8月关于刘少奇欲发动“军事政变”的报导，说是“毛为此被刘逼的‘走投无路’，才搞了文革”。这就是我说的那类“最新‘密笈’”。因“出土”于国外，又编得“有鼻子有眼”，读来“惊心动魄”，为人转发个不停。

三、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近来在和友人电话交谈中，常听到对本文的一种质疑，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所以，你文中关于‘反封建’一说，没有根据。”

因为不止一人有这类质疑，我就想一起对此答辩如下。

对于中国社会属性的判断，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如果认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属性，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应当怎样改革？近年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好像易中天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些名士的“颠覆性”新论是否可信呢？

我所看到对之的论述只是一句话：因为周朝“分封诸侯”，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封建制”在中国已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这样简单地来作社会性质划分，近乎是对“封建”二字的“望文生义”或“咬文嚼字”，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是个极大的误导。

我以为，判断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意，这里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仅指GDP的数值，而是主要指其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此外，也要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

如果这样来看，自周朝的“分封诸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政治体系、制度法令等虽各有不同，但“生产力”的水平大致相同，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生产关系”则定格在土地私有和租佃交易之上。

而千百年来，与之相应的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也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错，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个“皇帝坐龙庭”，要搞中央集权，但国家太大，关系复杂，交通不便，因而“皇亲国戚”、“封疆大吏”、“铁帽子王”还是不少，满清王朝也有个“八旗”，更不用说地方上有数不清的“土豪”占山为王、“恶霸”乡镇邻里。大家族各有“家规”，土皇帝亦有自己的“王法”。老蒋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到了老毛，他也怵八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久待坐大，要予以对调。

当然，从周的“诸侯自治”到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是国家体制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封建割据”也好，“皇帝独裁”也好，“专制”二字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方专制”或“中央专制”之不同罢了。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老化》，载《随想录》。〕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传统”或“特色”呢？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专制等级）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怎么可以轻言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对之“顶礼膜拜”，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讲得不错，“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因此，“走资派”刘少奇是对的，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中国要搞的是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我们今天重提“回归新民主主义”、重申“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其意义就在于此。

~~~~~

#### 【书刊评论】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 胡 平 •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

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先谈陶铸事件。

在 1966 年 8 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 1967 年 1 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冲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 1968 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 18 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简直就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然而今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在打压不同意见方面，却走得比江、胡还要远。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2015年8月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2015年9月

~~~~~

## 【劫后反思】

###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一）

• 陈 坡 •

◇ 写在《文化大革命沉思录》前面的话

文革的五十年，对于中国人，是特别的年份，特别难忘的岁月。五十知天命，五十年后知文革吗？国内刊行了几部文革史，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仍是独到的一部。与梯也尔那样的法国大革命史和麦考莱那样的英国革命史同等规模与水平的文革史，尚待时日。官方，一如既往是遗忘，似乎十年不曾存在。未销毁的档案密封在戒备森严的库房里。民间对文革

的兴趣与日俱增，口述史方兴未艾。而科学的研究则是期待。现实的烦恼与惶恐，也许是人们的过虑。我不认为文革有复辟的可能。虽然时常看到听到黑格尔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经常发生两次的警示，但文革是一去不复返了。神州已无毛泽东。副帅讲，五百年出一个。五百年或太长，五十年又太短。二十年来，为毛封神的势力与努力一直存在。海内外的舞文弄墨者编造了比毛生前更多的毛的神话。毛恐怕比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失去其本来面目而面目全非了。如果我们这个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族还可以复兴为有创造力的现代民族，参与现代文明的建设，那么，就一定不会忘记文革与文革的教训。当代中国起源于文革，当代中国的大部分问题亦起源于文革，中国人的文革情结与希伯来人的该隐情结一样，考验着国人的道德智慧。如此巨大的苦难与浩劫，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心在，人在，信史亦会在。

——草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

### ◇ 之一

文革如戏，有序幕，有高潮，有转折，有“神界的黄昏”，有尾声。但丁《神曲》的地狱、炼狱与天堂艺术地再现了文革的三个阶段。文革是神曲吗？是神的颂歌还是神的葬礼进行曲？什么是文革的主旋律？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这是反思文革碰到的首要问题。文革的性质当然不是什么反修防修，更不应从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中去判断。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困境看，大饥荒恢复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既恢复经济也恢复人性与人道的修正主义阶段（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的修正主义，还是东欧式的修正主义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纠正与缓和激进的阶级革命之消极后果的有益尝试）……文革显然是与休养生息的现实需要背道而驰的，是悖道之举，那么，这个逆举的风暴起于坚守列宁原教旨的“伟大领袖”，虽然文革的发动者承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纲领是斗私批修，试图以强制改造人性，是登峰造极的妄举。胡乔木说：世界观怎么能革命？革命怎么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修正主义被咒为罪恶之源，而文革的根本精神却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占据神圣性之缺位，以其“乾纲独断”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人性与社会的荒唐戏剧。

### ◇ 之二

以必然论阐述文革起源的理论模式应警惕陷入宿命论的观念陷阱，犹如对文革机制的制度性深层解析不能冲淡对个人责任的探究。勒庞讲得好，研究历史，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为什么难上加难？在人的观念、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未有实质性的改进时，历史不是创新，而是循环。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年了，对文革的认知有多少进步？对文革究竟有多少反思反省？研究文革，有多种视角，从下到上，从基层到中层，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到边疆，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在到过去，各有各的观察与判断……但文革毕竟是中央号召的，毛决策的，不是什么天然的群众运动，政治史，是文革的核心部分，是纲。因此，文革起源的谜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毛如何发动文革？文革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毛对文革起因的论述前后是否一致？其中前三个问题的探寻必须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与理论，尤其是延安时期以后领导集团的分化组合，比如毛的神话是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次造神运动的结晶，还要探索中苏关系之演变与国际共运的轨迹。因为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恶性的互动。

### ◇ 之三

个人崇拜是文革的突出现象，其规模与信众应为史无前例，亦是文革之祸因。怀疑一切的文革只有毛和毛思想不能怀疑、不准怀疑、禁止怀疑的。文革法是《公安六条》。毛是真理的化身，代表真理的领袖，片言只语皆是最高指示。个人崇拜即偶像崇拜，对领袖的偶像崇拜与盲目信仰。在无神论的国度、地区与文明，是否必然发生偶像崇拜，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无神论的文化土质与心理结构容易滋生偶像崇拜的奇观。而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走火入魔的崇拜狂潮，有其强力的政治推动，有其历史的前因后果，是封闭社会的特有现象。在文革结束时通称为个人崇拜，或因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说法，亦称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更为准确。个人崇拜与迷信在共产国际与中共都有悠久的历史。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也自认为是斯大林。所以，不仅应梳理解析延安至文革刘、彭、林、周鼓吹领袖崇拜编织领袖神话的历史，也要探明毛泽东崇拜毛主席的自弹自唱。毛从中共八大以后发明“两种崇拜”的诡辩到主张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鼓励党内外对他本人的崇拜，实为有意识地为其政治上的个人独断取得正当性。

#### ◇ 之四

什么是文革？这是文革的算术题，也是文革的代数题。作为文革中隶属于单位共同体而为户籍束缚无力逃脱的中国人，几乎都被动员而自愿不自愿地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时而叱咤风云时而身陷囹圄，造反、保守、逍遥，经受无常命运的起伏与感受人世炎凉的沧桑。每个亲历文革十年的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史，也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图像。只要诚实地面对自我，谁也不能不拷问文革。不知为什么，胡风那有点拗口的名句“精神奴役的创伤”时时想起，余味无尽。精神被奴役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痕，曾以“伤痕文学”记录一代人沉痛的心灵历程。经历了，并不意味着理解。我以为应以人道主义的宽阔视野研究反人道主义的文革，文革的存在状态：恐惧，政治恐怖，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匮乏，意识形态疯狂，不是正常的心智所能参透的。那么，文革究竟是什么？谁的文革？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民众究竟从文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三年还是十年？文革是历史、文化与语言的断裂，偶然意志的捉弄，左派之间的内哄，还是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史的必然？绘制怎样的一画文革图像才能更理性更完整地把握文革的现实？文革，结束了吗？

#### ◇ 之五

对于文革的后果、后遗症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长远影响，绝不能低估。估为文革残余是轻敌。毛的遗体展示在首都的广场上，其“反资反修”的魔咒活在国人的神经中。毛左，活跃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文革，亦被文革理论家巧伪包装。最悲哀的是，我们都从毛时代走过，曾是毛左、毛分子，红小兵，红卫兵，有毛思想的遗因，同一物种……韶山，会是毛崇拜者的圣地吗？领袖崇拜会死灰复燃？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的崇拜中心是太阳，难道神洲还会升起人样的太阳吗？从文革到改革，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碎裂与文化的废墟……文革既连根铲除了传统文化，又根本摧毁了神圣性根基。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去神性化与去人性化是文革与文革精神的主要特征。民国消失在遥远的过去。反思文革的两个维度——精神与理性，是人之为不可或缺，是首先应确立的“理论良心”。无神圣性的根基，精神落叶无根，百孔千疮的人心难以自安，而无科学的分析逻辑，就不存在理性的条件。“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 ◇ 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赶超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而且是以运动治国施政的大失败，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

情万丈的向全球宣战相比，因饥饿而死亡的 3000—4000 万生灵煎熬着现实的人间，断粮的恐惧时时刻刻日夜折磨着国务院，甚至应该说，47 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谁应负责？“人相食，要上书的”。自命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家怎样对待自己犯下的弥天大错？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责任归属……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毛。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独裁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中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 ◇ 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 62 年以后高层分歧的逐步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 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 56 年宣告终结，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阶级基本消亡，党国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 57 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62 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在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满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评定的毛在思想史上的与政治实践上的荒唐阶段。

#### ◇ 之八

59 年的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卢，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高踞政治局之上，我行我素。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把 58 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顾全毛的体面，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 ◇ 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

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 300 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他主张“退够”。刘在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提出对四年失误要讲透，有多少讲多少，中央负主要负责，失误原因与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及会后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关，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重病要用猛药。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尤其刘的主张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 ◇ 之十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回避了毛进行超英赶美的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1)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没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峰，毛把七千人当做牺牲品抛给了受其迷惑的暴民，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会湮没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上山下乡冷却。

(2) 40 后 50 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少年童年时代的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而第二面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奉旨造反释放了青春期受压抑的冲动。(3)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六十年代中期破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 年)到庐山会议(70 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发动与运行，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4)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刘少奇曾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 1962 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和批评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毛刘分歧也是由此扩大的。江青 68 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 1962 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似乎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 ◇ 之十一

如果说，58 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 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 61 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



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 ◇ 之十二

内政决定外交，内政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党关系。大跃进失败后的政治斗争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个政治的主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反美的革命，在国内坚持清肃异己异议的“阶级斗争”，而苏联苏共的最大罪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自称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62年以后毛从国际反美转向反美反苏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也是触怒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借势把这种激进好战的反苏反修转向国内党内，制造紧张气氛，如给对大跃进有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构陷了“里通外国”的罪状以置之死地令彭死不瞑目。所谓中苏大论战，虽有邓小平后来所谓民族“受屈辱”之曲辩，实质是服务服从于国内党内的毛式阶级斗争政治的需要，以坚持列宁原教旨应对国际和平、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变局，固步自封，饰非拒谏，以遮蔽内政失误转移危机并压制正常的批评异议，是一种愚臣愚民手段。反修反帝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

## ◇ 之十三

托毛之赐，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但又有几人真识这位矿工之子呢？赫氏作为退休者临终曾经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但赫氏无负于中国，反而有功，沙俄从中国东北掠取的权益是赫氏时代归还的，对华工业与军事的大规模援助是赫氏完成的，大饥荒时期又是赫氏主动提出对华援助粮食与糖，延缓偿债……但毛对赫的善举不屑一顾，以赫为国际头号大敌，主要是因为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在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暴君斯大林，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戳中了毛继承斯大林的中国梦，对毛来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亦不可低估。刘认为应译为“个人迷信”。两卷《斯大林批判文集》证明赫氏报告的国际影响。中国“右派”的某些思想资源亦出自赫氏的报告。赫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家，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一系列改变列一斯原教旨主义的举措，主张裁军，限制核武，与西方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不仅如此，赫氏对斯大林的挖尸焚灰也刺痛了毛，更让心高气傲的毛难以容忍的，是赫对大跃进的抨击并批评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这是毛的麦城。58年与赫开始决裂，62年以后组织对苏共的九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指赫鲁晓夫与铁托，剑指中国的赫鲁晓夫。赫是毛的恶梦。毛至死未忘土豆烧牛肉。

## ◇ 之十四

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无可讳言，文革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刘邓彭贺罗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刘是文革打倒的首要对象。因此，不探究详查毛刘从合作、结盟到分歧、对立、决裂的全过程，就无法把握文革的起因。而不洞察毛何以利用以破坏为目的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和全面夺权的方式即“全面内战”（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摧垮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权力集团，而不是像对高岗彭德怀那样通过党内整肃予以罢黜，就不能深刻地认识文革的特殊性以及文革的消极后果。因为文革是领袖独断与群氓暴政的大动乱，是人类政治史上两种最坏的奴役形态的结合，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愚弄参与秘密政治的高层政争，打断了国

家正常进化的过程，为祸甚巨，为害甚深，对几代人都是难以解脱的精神创伤。高层权争政争以全社会长期动荡内乱为代价，以亿万家庭生离死别的沧桑巨变结束，史无前例，也可能后无来者。文革的群众性是其反思的难点。然而，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

#### ◇ 之十五

中共建政以后毛刘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其结果是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与高饶事件。一次是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其结果是58年南宁会议与大跃进。一次是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其结果是调整政策、经济复苏和文革。毛刘分歧公开显露于65年社教运动的一次对话，这个运动局部试点于62年下半年，是毛布置阶级斗争的产物。对大面积饥荒与非正常死人的反应，如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毛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及党内坏人捣乱破坏，因而要求民主革命补课。其后果是更大的灾荒与人祸。经济调整政策的逐渐生效，毛认为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62到65年，毛有计划地部署从基层到高层以及从国际到国内的所谓阶级斗争，以收回一线中央的权力，回到前台。文革之前，公安部明文规定的阶级敌人即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多达三千万人，株连亲属多达亿人以上。刘应对毛式阶级进攻战略的方法，是将斗争的锋芒引向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引向文化领域与传统的革命对象，这是毛刘分歧的政治背景，而自64年开始，毛已从大饥荒的消沉中振起，以政治策略家的机谋实施剪除刘邓中央一线的一系列政治设计……

#### ◇ 之十六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是六十年代前五年的记忆符号，革命与阶级斗争则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五年间的记忆符号。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无论多少妙笔，多神画技，也绘制不出另类的图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权利的意识，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研究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是一件枯燥且劳而无功的苦差事。文革的反动，不仅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而是国民心理对文革理论——阶级与专政——的永久的厌倦与厌弃。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宜细不宜粗地反复考量，它离开文明究竟有多远？！《苦恋》结尾的人字问号意味深长，“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文革，使亿万人难以进化为现代人。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秤，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 ◇ 之十七

毛是从文武两条战线进袭一线中央的。对毛来说，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枪杆子是政权的根本，枪杆子亦是文革的支柱。64—65年，毛决定在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其主要负责人由军队派任。在毛看来，当时形成了刘邓彭掌控的党机器与刘贺罗掌控的军事机器，而罗是兼跨党政军的实权人物。罗对刘贺的效从和刘对罗的信用是文革发动的绊脚石，亦是文革的隐患。65年底神秘的上海会议以“野心家”（“篡军反党”）和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罢黜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罗，诬其为抢班夺权的“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是毛利用军内将帅矛盾联手林周叶的重大政治战役。整罗，也是对周的警示。罗案曾是中共建政史的最大谜案之一，亦被当作林彪与毛交易陷害忠良的罪证。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罗案的庐山面目露真容。朱德对罗案将导致“党内不平安”的感叹一语成谶。罗案后，林叶杨取代贺罗，叶是罗

案的关键参与者与受益者。杨亦举足轻重，为军中翘楚。罗案则是文革内乱大动荡的真正开端。

#### ◇ 之十八

另一条战线是文。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是毛时代的重要特征。毛深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影响力。造舆论是夺权的先声。毛发动党内清洗与政治运动的惯例，是首先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名不正言不顺。65年初毛秘授江青先通过华东局后找上海市委谋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刊于65年11月《文汇报》，几乎与罗案同时，被官方和学界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信号。这篇文章批判的重点是明代清官海瑞的“退田”，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毛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影射庐山会议罢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的官。“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彭即当代海瑞。几乎同时，彭被毛劝说离京到西南任职。尽管作为文革信号的姚文在当时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知其政治含义，邓小平依旧找吴晗打牌，周恩来将姚文转载于《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栏，试图将其向学术论争方向引导。被毛誉为“红秀才”评海文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一直在幕后的毛夫人江青的政治亮相。“露峥嵘”。但历史将昭示，缓解大饥荒的经济政策对患有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的毛而言，是新一轮政治整肃的突破口。其罪名是“修正主义”。

#### ◇ 之十九

历史与文艺，是毛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两大重心。从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毛讲话到66年初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其主旨都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权力需要服务。江青的这个纪要，把文艺政治化到“尖锐阶级斗争”的程度，以文艺问题为政治问题，锋芒直指陆周的中宣部文化部，开辟了攻击刘邓陆的文化舆论战线，是中共建政以后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丁冯的继续，其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否定中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否定苏联的经典作品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否定三十年代的国防文学，达到“我花开来百花杀”的地步，堪称全盘推倒所谓“封资修”即人类艺术成果的文艺虚无主义的典范。其中提及接受斯大林的所谓教训竟然是斯大林无批判地继承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典著作。纪要经毛多次修改并以“林彪同志委托”向全军全党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发。毛邀请林彪这个“尊神”为其夫人助威。江青从此以创造京剧革命的“文艺旗手”的身份称霸文坛，闯进政坛，呼风唤雨，并以文艺文化为利器向彭真限制文革的《二月提纲》开刀，文革夫妻店敲响了毁灭文化自我膨胀的震天锣鼓。

#### ◇ 之二十

林、周是毛发动文革稳定军政的柱石，没有林、周的支持，文革难以发动，发动了也难以控制。林、周在文革前期对毛的辅助是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故其对文革的灾难亦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也是林、周，后来却成了文革的制约因素。69年九大以后的毛林分歧以林71年9月13日出逃苏蒙实践了高岗、彭德怀里通苏共的罪名，震惊中外。林案的扑朔迷离演绎为当世的拍案惊奇。毛主持的对林的揭露批判令国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私下对毛腹诽最多最尖刻，“妄议”毛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诡计，不是愚忠，而是利忠，利用之利也。“主先臣后”、“主倡臣和”……林以宫廷政治的诈术对毛。作为林政变纲领印发全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批林文件竟是一篇石破天惊鞭辟入里的讨毛檄文，道出了毛式整人政治的真相，直指毛为秦始皇，毛时代为秦皇时代……毛苦心虚构的文革理论顿时破灭为举国的笑柄，所谓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所谓文革理想的五七指示，不过是烟幕。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宫廷的权力角逐。最最革命的话语后面是“封建复辟”。无论张春桥辈如何妙

笔生花，罕有人信以为真了。而周，以其老成稳重鹤立为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与二次出山的邓共同为结束文革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准备。

（作者简介：陈坡，党史专家，1982 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未完待续）

□ 原载《爱思想》网

~~~~~

## 【千秋功罪】

两派红卫兵，为什么都不愿意道歉？

• 谌旭彬 •

◇ 红卫兵两大派系的历史作为与现实境遇，俱在阻碍其作出反思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1、“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长期热衷于渲染自己在文革中起到了理性的“维稳”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 1955 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 11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

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是这样表述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大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动乱史》，人民出版社）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

2、“造反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被列为“三种人”，大多深感不平，认为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王祖镔，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入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意，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

‘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不可否认，王祖镔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 必须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才有可能促成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 1、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把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人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 2、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还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 3、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

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 结语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

### ◇ 原载微信号《短史记》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